

教育研究集刊
第六十七輯第四期 2021年12月 頁113-121

評介《挑戰北京的天命： 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

Book Review: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 Umbrella Movement

詹盛如



壹、緒論

此次挑選《挑戰北京的天命：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乙書作為評介對象，主要用意在彌補國內對於「教育與學生社會運動」議題的空白與缺席，希望在介紹本書內容之餘，能夠激發國內教育領域（特別是教育社會學）專家學者致力教育與社會運動之間的研究，充實理論與實務的缺憾，透過本書評彰顯本主題在教育類期刊的價值與重要意義。社會運動在過去20年來已經是亞洲相當普遍且常見的社會現象，這與過去認定亞洲是保守社會，強調秩序、和諧的傳統有相當大的落差。事實上，韓國、臺灣、香港、馬來西亞、泰國與新加坡都因為政治變遷、經濟議題或是國內的環保與社會議題而出現過大規模的社會抗爭行

為；今年（2021年）的緬甸軍事政變，也激起當地大學生與年輕世代的普遍關注和參與，企圖喚醒當地人民的參與。而這些近年來的大型社會運動事件，事實上都與青年的組織、動員及領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西方學者甚至直指「學生是青年革命的急先鋒」（students are the vanguard in the youth revolution）（Altbach & Luescher, 2019）。

儘管當前各級學生是社會運動的要角，扮演諸多關鍵角色與發揮諸多重要功能，但是在教育學術圈，並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與研究。國內主要投入研究的是社會學與政治學者，以及少數的傳播研究人員，至於教育學術圈則少有人針對此議題發表相關論述與著作，進行深入研究。坦白說，這是相當可惜的，畢竟教育社會學、成人教育與高等教育三個次領域原都與當代青年人參與社會運動息息相關，也都有相對應的理論或實踐假設，但是2000年代後，隨著臺灣的民主化日趨成熟，社會／學生運動的日益頻繁，深刻且在地的教育學術分析卻不多見。

所幸，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何明修教授積極投入該領域，針對臺港兩地近年來大型社會運動有廣泛且持續的耕耘，他在2019年的中、英文兩本著作，兼具歷史社會學的視野，田野細膩的描述與分析，搭配其擅長的巨觀的比較研究，的確能讓國內讀者對社會運動研究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本文主要評介何教授在2019年出版的《挑戰北京的天命：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該書由美國Temple大學出版社發行。此英文專書與中文書《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由左岸文化所出版），兩者內容有相當程度的重疊，惟章節結構有不同的安排，讀者可以交互參酌。底下評介以英文版本為主。

貳、書籍內容與大要

《挑戰北京的天命》乙書架構有八章，主要包括導論、臺港兩地的社會狀態、中國影響、社會運動網路、機會、威脅與對峙（臺灣與香港）、臨機應變（improvisation），以及占領過後（the morning after）等。首先，作者在導論中明確指出，本書主要在探討六個知識上的謎團，包括保守社會中的激進抗爭、

「機會渺茫」的抗爭、學生的領導地位、運動資源的詛咒、自動自發的運動貢獻，以及團結與分裂等。這六大議題與大環境結構多相嵌合，也直指社會運動內在本質的議題，包括領導者、資源動員、追隨者的角色定位，以及中長期後續運動的發展與動能議題。也因為處理的議題範疇廣泛且深入，作者直言，他使用的是「綜合觀點」（synthetic perspective），結合傳統主流的「網絡、生成、機會與威脅」（network and gene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的觀點，來瞭解臺港兩起大型社會抗爭事件，同時也汲取建構主義陣營的理路思維，剖析當事人傳記（biography）、創意嬉戲（creative playfulness）、情緒面向在社會運動所扮演的動能與角色，實質結合「結構」（structure）與「能动性」（agency）的特長，企圖達成「理論綜攝」（theoretical syncretism）的目標，引導世人對社會運動新的智識理解。

第一章談到臺灣與香港兩個社會在2003年之前的重要演變，內容強調由於過去分別遭受日本與英國殖民的傳統，因而導致人民對於政治參與的冷漠與忽視，但是作者也提及自1970年代開始，兩地社會知識青年的覺醒逐漸改變當時不涉足政治的傳統。隨後，1980年代臺灣邁向成功的民主化運動，而香港則陷入困頓當中，作者認為這與兩地國族主義分道揚鑣有深度的關聯。

邁入21世紀之後，臺港兩地的命運同時深受中國的影響。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臺灣與香港都有逐步整合的壓力與需求。在政治改革面，臺灣持續民主轉型，但是香港則面對受限的民主參與。反映在經濟上，臺灣的確深度依賴中國製品與市場，中國所採用的「讓利」（conceding benefits）作為，逐步侵蝕臺灣的經濟獨立性。同樣地，香港所鏈結的珠三角廣大經濟市場，甚至作為中國面對世界的金融中心，都加速融入中國的步調與規模。然而，也就在這樣的經濟整合過程中，作者指出香港人對於政治的整合發出了不滿與怨氣（grievance）；起點在於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國安法）的制定，引發港人對於中國政府治理缺乏效能的怨氣，隨後中國也對民主派訴求的特首直選採取質疑、否定的做法，逐步讓香港人在政策、治理及民主參與上累積更多的民怨。再加上，香港人擔心日益顯著的「大陸化」（Mainlandization），也惡化港人「認同」議題的問題。臺灣在面對中國崛起後，香港的一國兩制成為樣板，但是如同作者所指出的，臺灣抗拒「香港化」（Hongkongnization）的

力量也在增強之中，以臺灣意識為主的國族主義則不斷地上升，終於導致臺灣國族認同的改變，截至2016年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比率已經高達60%。而香港人的認同也從2008年開始逐步攀升，到了2016年時已經有40%的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則下降至20%以下。這些政治、經濟的變局，搭配著國族認同的翻轉，在在成為社會抗爭與運動的重要動力來源。作者詳細分析了2006~2013年的臺港社會運動，焦點集中在抗爭時間、規模與密集度等因素，總結發現臺港兩地的公民社會日趨活躍，從2008年開始，大規模對抗政府的行動更趨於堅定且持續。而這些社會抗爭運動，根據作者的分析，都與中國有著密切關係。

第三章，作者將焦點從巨觀國家／社會之間的矛盾，轉移至「社會運動網路」（social movement network）的建構。在作者眼中，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都是2010年代前後所有不滿能量的累積與相互串聯。換言之，年輕世代面對經濟的轉型痛苦與就業困難，不斷地累積社會運動能量，加上學生網絡的成熟、非政府組織與反對黨的加入，都成為壯大後期社會運動的關鍵。在臺灣，作者指出從2008年野草莓運動開始，到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都有清晰的繼承脈絡可尋。這裡面包含跨校區之間關鍵學生的組成，他們與非政府組織與民進黨的結合都有多重的連結。至於在香港方面，學生激進主義（student activism）其實在1990年代乃至2008年之前都處於沉寂的狀態，直到「反高鐵運動」（Anti-express Rail Movement）之後，才重新被點燃動能。本章詳述香港大學的學生組織如何重新與其他公民團體、民間組織及政治團體相互連結，並且獲得支持。本章亦探討社會媒體（social media）包括臉書等，在串聯各方能量時的關鍵角色與功能。同時，作者也討論到社會運動網路內部的「團結與分裂」議題。顯然，臺灣有更高的團結度，而香港面對更多的分裂危機，這些危機甚至延續到社會運動當中，以及運動結束之後，持續影響香港反對運動能量的凝聚與否。當然，臺灣與香港兩地之間的社會運動也在2010年代開始彼此相互交流、呼應，甚至跨境支撐，這些發展都非常值得學術界深入探索。

第四章與第五章則深入到社會運動發生時的動力學（dynamics），如同作者所宣稱的，他不完全從「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OS）的角度分析，而是採取「政治機會」的概念架構。不論是太陽花運動或

是雨傘運動，其分析架構均為三個重要階段元素：機會、威脅與對峙。根據作者分析，臺灣太陽花運動的出現有三大結構性機會，分別是政權動向（regime orientation）、執政黨菁英不團結（disunity among ruling elites），以及政治盟友支持（support of political allies）。首先，當時的馬英九政府積極推動兩岸服務貿易的立法工作，當時所有法定程序都已窮盡，但是反對黨仍無力阻止；其次是執政黨內部菁英出現矛盾分裂；最後，則是民進黨持續提供學生支持與協助等。而威脅元素則來自於執政黨立法委員用30秒通過法案，形成巨大的壓力來源，有效喚醒民眾進行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作者認為，就是這樣的「立即威脅」讓原本潛藏的網絡能量得以迅速動員，找到切入的角度，喚醒支持者採取立即對抗政府的訴求，產生「由威脅驅動的動員」。之後，學生帶領的「占領立法院」獲得更廣大民眾的同情與支持，許多人自動自發地提供抗爭運動所需要的資源、後勤補給與合法性基礎，因此逐步形成與政府「對峙」的格局，時間長達24天之久。所幸，在對峙之後，最終在各方協調之下，太陽花運動以符合多數抗爭者期待的結果落幕。

延續臺灣的分析架構，第五章針對香港的個案，也是聚焦在分析「政治機會」如何觸動社會運動，但是作者特別指出雨傘運動是在延續「未完成的民主化方案」（unfinished project of democratization），先前的相關運動包括「占領中環」（occupy Central Campaign）、「占領公民廣場」（occupying Civic Square）等推動民主化的活動。至於在政治機會的分析上，當時政權動向並不利於社會運動，因為香港政府正在研擬選舉改革方案；不過，執政菁英的穩定性卻有所不足，主因是梁振英特首當時對內並未獲得實質性的支持，而且中國也有質疑他的跡象，導致香港「在地菁英關係不穩定」；最後，在政治盟友方面，香港的泛民派（Pan-democrats）並不團結，甚至還不支持占中運動，局勢對民主運動不太有利。事實上，對比太陽花運動的政治機會，香港雨傘運動遭逢更艱困的情境與背景條件。真正催化動員效果的是「催淚彈的震撼效果」（the tear-gas shock），在占領公民廣場運動中，警方「過度使用攻擊性武力導致了反效果」，突然的威脅激發更多人參與抗爭，藉以對抗警察處理方式的不滿。本章後續更關注了「學生領導」的樣態、角色與處境，並比較臺港兩次大規模運動中的為難與無力之處，特別是在雨傘運動中「好戰份子」（militant）的出現，都令學生領袖處於

困境當中，在在挑戰社會運動內部團結、決策與領導效能。

第六章，作者將重點從傳統「動員」理論轉移至「臨機應變」（improvisation）的概念上，實際反映「能動性」（agency），這些不在規劃內且去中心化的決策型態，具備撼動社會運動的走向與結果的效能。從實際的類型來看，臨機應變包括以下五種形式：後勤補給、鼓勵參與和久留、維持士氣、呈現正面形象，以及重起運動攻勢等。根據作者的分析，這類作為都深刻反映了「去中心化的合作」（decentralized collaboration）特性，由非領導者透過由下而上的參與方式，支撐核心運動的聲勢，並持續提供動能。但是，這些臨機應變的樣貌亦有其限制之處，包括受限於個別參與者的自主性、保守的政治文化、參與者彼此間的團結程度等議題。

分析完社會運動內部能動性狀態後，作者在第七章將重點拉回到「結構」層面的視角，審視社會運動所帶來的不同面向的結果或影響。首先，作者指出幾乎許多社會運動的領導者都有「運動傷害」（movement injuries），伴隨著許多負面的情緒陰影，需要時間自我療癒。在這兩項大型運動之後，臺港又紛紛經歷其他小型的抗爭，例如臺灣的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香港的魚蛋革命等。事實上，當時部分學生領袖也因為社會運動的洗禮，挾其清新與知名度，不少青年世代投入後續的政治選戰當中，但是結果不如預期，許多人都鎩羽而歸，無法在選戰中勝選。最後，本章分析這兩個大型運動後對政治產生的結果（consequences）、與反對陣營的關係，以及國際各界與北京的回應等議題。

最後，總結的部分，作者重新梳理了兩場石破天驚的社會運動，雖然不在預期中，但卻深刻地影響臺灣與香港的發展前景。透過前述七個章節的鋪陳與論證，作者回到最初的六個知識謎團／概念假設，並且給出他的答案與觀點。首先，臺港兩場社會運動無疑是對地緣政治的回應，不希望遭受中國新殖民主義的威脅（謎團1），而且臺港政權在處置這些壓力時，都犯下了致命錯誤，讓公民感受到立即威脅（謎團2），強化動員的廣度與效果。而學生作為運動領袖，意味著傳承儒家社會良心的角色，但也反映了當代青年的造反風潮（謎團3），雖然兩場社會運動帶來關鍵性影響，但臺灣的領導相對有效能且組織化，不過卻是「偶然形成」（謎團4），透過「臨機應變」的概念才得以解釋（謎團5），在缺乏準備狀態下，仍能維持長期對峙的格局。而在社會運動結束之後的差異制度性

因素（謎團6），卻讓臺灣引導民進黨吸納了年輕運動者，相反地，香港的泛民政黨卻削弱了既有反對勢力。此外，基於本書的研究發現，作者也提供了社會運動在方法論上的洞察與建議，首先，何明修建議應將動員研究置於更廣大的社會變遷脈絡，其次，必須將觀察延伸至動員結束之後的時期，也應該專注重重新連結抗議與體制內的政治等。最後，作者從「邊陲公民社會」的角度，審視中國崛起的影響，指出中國的銳實力（sharp power）正在重新塑造地緣政治與區域秩序，更深刻地入侵到臺港兩地內部自主決策的空間與生活型態。

參、評述與反思

本書的確突破舊有框架，結合巨觀與微觀的觀點，重新審視臺港這兩場影響深遠的運動，不論在社會學、政治學或政治經濟學都有很重要的學術價值。不過，正如本文破題即指出的缺乏與空白，就是教育學術圈的缺席，特別是高等教育以及教育社會學都應該發展新的論述與觀點，積極投入相關主題分析。以下就本書所觸及或引發的相關主題進行檢視與討論。

一、保守的東亞社會與廣泛的社會運動：教育部門的角色

如同作者所提出的疑問，東亞社會一向被認為是重視秩序、和諧、忍讓與權威的社會，為何會出面規模龐大的社會運動，而且持續數年不止。何明修認為這與臺灣和香港持續在經濟與政治面與中國整合，所引發的「民主價值」矛盾有密切關係。但是從教育的層面觀察，這與青年世代與民眾如何認知與接納社會運動有關。換言之，普及且優質的教育是否是觸動與支撐社會運動的關鍵因素呢？因此，教育學者可深入分析：當今教育體制能否奠定學生的社會運動的素養、能力與實踐技能呢？學校系統是保守的反動勢力，抑或引領與觸發運動發展的堅實後盾？這些都需要有深入且全面的學理分析與證據，據以補充作者在巨觀層面的論點。

二、學生在社會運動中的領導角色：權威、合法性與效能

無庸置疑地，在過去數年的社會運動中，亞洲的青年世代肯定占據關鍵的位

置，他們經常是意見領袖、組織動員或規劃者。本書也以豐厚的敘述，點出學生在這些運動中的定位。但是少有研究分析，學生如何樹立領導的權威性或合法性。何明修雖然指出「儒家知識份子」的觀點，認為他們扮演社會良知角色，而且清新、不沾染政治，但是人們實際如何相信他們的決策判斷、領導效能與合法性，這些細膩的動態過程，少有人探究。畢竟，青年學生沒有社會歷練、缺乏行政思維，甚至連如何貫徹決定，也都可能略顯生疏，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討學生在社會運動的領導效能或權威性，這在理論方面具有嶄新的突破性，在實踐層面也有參考價值。

三、大學內部治理與社會運動

儘管社會運動在亞洲出現的現象日益頻繁，規模大小不一而足。但是，類似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這類的大型社會運動，的確對大學內部治理形成挑戰與威脅。因為不容否認的是，社會運動發生時，經常可能破壞社會秩序、違反政府命令，甚至波及他人的財產與性命（還有學生自身的安全議題），大學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呢？基本上，在臺灣的幾次社會運動中，大學內部對於學生幾乎抱以支持與同情的態度。但是，香港在反送中的歷程，校園淪為「戰場」（battle field），作為學校領導者究竟應該如何面對這樣困頓的局面呢？如何在穩定校園安全與持續運作的條件下，提供學生抗爭與發聲的空間，的確是值得探討的議題。當然，在社會運動參與者日益年輕化的同時，學校的領導者如何在家長觀點、學生意願，以及促進學習的角度，維持平衡，的確是治理的挑戰。

四、教育人員與教授的角色

延續前面的主要論點，教育部門在當今的社會運動到底扮演怎樣的角色，也可以從在社會運動中教育人員與教授的行為、言行與涉入方式的角度切入。以臺灣這幾年來的經驗顯示，許多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學者提倡「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運動作為呼應，甚至在社會運動發生時，以「街頭上課」或「現場學習」之名相互呼應；當然亦有部分學者持批評與反對立場，諸多樣態彰顯出教育部門對於社會運動的多元觀點與涉入方式。這類的分析與探索，將有助於拓展原有教育領域的研究視野與觀點，厚實教育在社會運動領域中的研究。

五、參與社會運動者對學習與生涯發展的影響

最後，社會運動到底會對年輕學生帶來何種影響呢？在情緒反應、認知學習歷程、社會鏈結、認同形塑與生涯發展究竟會帶來何種效果呢？一般非核心參與者，當社會運動退去，自然回歸一般生活型態，但是對於部分核心學生或青年，則是長久且深刻的印記。書中提及「運動傷害」，負面情緒久久無法退散，他們如何解讀「後運動」時期的心理變化，認知自己的所作所為，串聯廣泛社會，塑造自我的新認同等，這些核心議題值得教育、心理領域學者探索，特別是他們後續生涯發展的軌跡與變遷，都有深刻的學術價值與意涵。

DOI: 10.53106/102887082021126704004

參考文獻

- Altbach, P., & Luescher, T. (2019). *Students are the vanguard in the youth revolution of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191204072235611>
- Ho, M.-S. (2019).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 Umbrella Movement*.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